

Criticisms  
on American  
美国

华文

文学论

主 编 黄万华  
副主编 孙基林 施战军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美国华文文学论/黄万华主编 一济南: 山东文艺出版社, 2000.5

ISBN 7-5329-1804-1

I. 美… II. 黄… III. ①中文-文学-文学评论-美国②中文-文学-文学研究-美国 IV. 1712.07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0) 第 07298 号

山东文艺出版社出版  
(济南经九路胜利大街)  
山东省新华书店发行  
山东省莱芜市印刷厂印刷

\*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14.5 印张 1 插页 346 千字

2000 年 5 月第 1 版 2000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1000

定价 26.00 元

## 序

孔范今

大约是在一年以前，美籍华人作家黄运基先生为着拜访万华先生来到济南，接待他时我也叨陪末座。记得当时万华先生曾经说起，他正着手编撰一部《美国华文文学论》，而且比较详尽地介绍了他对多半个世纪以来美华文学发展状况的认识与评价。听着他如数家珍般对美华各作家群落的精辟点评与对其历史流变的清晰梳理，我和在座的各位都不禁为之深受触动。当时我就想，万华先生业已成竹在胸，此书的成书与出版都当为期不远了。

现在，这部书果然就要面世了，我为它高兴，更为万华先生又一富有实绩的学术开拓和向预设学术建构目标的进一步逼近而激动不已。因为我早就知道，数年前万华先生就已确立了一个十分宏伟而且诱人的学术建构目标，那就是对 20 世纪华文文学史的整合与编撰。我深知完成这一巨型课题所必将面对的困难会有多大，但同时万华先生的必定成功又深信不疑。试想，有谁会怀疑一个把学术看得比生命更重要，终日焚膏继晷，在学术上精

进不已的学者的成功呢？何况我还知道，这些年来万华先生一家节衣缩食，先人一步与国外华文文学界取得了广泛而长期的通讯与资料交流关系，其所得资料的全面与丰富，就个人对资料的占有而言，怕是学界很少能有人与之相比。而且他做学问，稳扎稳打，不激不随，总能保持一种独立、有序而且有效的状态，如蚕之食桑吐丝，如牛之吃草泌奶，再繁杂的材料经他咀嚼消化，一定会产生出一个清晰、鲜明而又独到的认识。1999年，由山东文艺出版社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先后推出了他的《新马百年华文小说史》和《文化转换中的世界华文文学》两部专著，那时我即意识到，万华先生已一步步把愿望变为现实了。

学界的许多朋友都知道，万华先生一向习惯于在流行性文学史视野之外作扩张式开拓，并以其原生性的对象发现和原创性的观念建构回过头来影响和改变现有的文学史认识。早在80年代中前期，他就率先开始了对抗战时期沦陷区文学的勘探与全面开发，此后成果迭出，成了这方面研究的知名且被人信赖的专家。我记得80年代中后期我编辑《中国现代文学补遗书系》的时候，为了觅得东北沦陷区“艺文志派”代表爵青的《欧阳家底人们》，曾派人去找遍了东北三省各大图书馆而不得，最后还是致函万华先生，从他那里得到了这部作品的复印件。当时即十分感佩他在开掘这一新领域中所下功夫之深，以及其治学的扎实与勤谨。嗣后，当接连而出的各种新的文学史在“重写”过程中已将“沦陷区文学”纳入其并不尽相同的结构中时，万华先生的学术视野则又由沦陷区而台港澳，由台港澳而东南亚，由东南亚而欧美澳（洲），自觉扩大到20世纪世界华文文学这一更加宽阔的领域，而且从中窥视到了华文文学在世界性历史空间和世界一体化格局中生成发展的多种样态，及其在多元中客观呈现的互补性意义结构。当然，目前致力于海外华文文学研究的人并不只他一人，而

且这一研究已日渐成为文学研究领域的一个热点，但就我所知，能像他这样作全局性（包括中国大陆和台港澳在内）研究并已作出建构性实绩的人并不多。我以为，万华先生面对这一学术对象所作的观念调整及其提出的已基本形成系统的建设性意见，应该引起人们更多的重视和思考。

不管别人怎么看，我坚持认为“世界华文文学史”这一新史学范畴的提出，无异于文学史领域中的又一次革命。诚然，我并不认为它与国别文学史的研究与建构之间存在着无法消解的矛盾或必欲取代后者的关系，因为它们是在不同的对象约定和不同的视角选择中各有意义呈现的两种不同的史学建构，至少在国别还存在的时候，国别文学史的深化研究与不断“重写”，相对来说都仍然会是一项更为基本的学术需要和学术行为。相反，我倒是认为在二者之间存在着一种既互相区别又互相依傍的互动关系。一方面，如果没有对中国国别文学史的科学性建构做基础，即对华文文学中心区的情况缺乏明晰而准确的把握，那么其所谓“世界华文文学史”也只能是名不副实的零散的边缘性建构。而另一方面，假若对海外华文文学的生成发展没有全面的了解与探讨，那么对事实上存在于超越国别界限交流生长中的国别文学也就不能作出更符合事实的科学阐释。我之称其为“革命”，指的是它对传统国别文学史视角及建构模式的超越，对新的史学视角的开辟和另一种文学史类型的设定。其中的道理应该不难理解。国别文学史比如“20世纪中国文学史”，必须特别重视对中国这段历史的独特内涵及其作用于文学的内在机制的深入探讨，而“20世纪华文文学史”则不必，因为海外华文文学的发生固然不能不与中国新的历史特征有关，但其一旦成为生长于域外的新的文学类型时，这种关联就不复存在，至少是并非直接性的存在了。因此，“20世纪华文文学史”所以能够成立的基础，只有一点，那

就是“华文文学”这一文化上的统一性了。万华先生在《文化转换中的世界华文文学》一书的封底上写上了这样一段话，我以为是有见地的：“带一双文化的眼睛，才足以感受得到 20 世纪在中国大陆、台港澳地区、亚欧美澳各国播散下的华文文学种子的活力。”所以，所谓“20 世纪华文文学史”，是在文化视角中对超国别存在的世界性华文文学的一种全景式观察和历史的梳理，对于我国来说，这是一种前所未有的全新的文学史类型。这种文学史会更加有效地揭示出 20 世纪中国文化在世界范围内与异质文化对接、冲撞、生成发展的更为宽泛的事实，和在世界一体化过程中中西文化双向汇流的真实样态，这则是国别文学史所难以做到的。

这部《美国华文文学论》，是万华先生整个学术规划中的一个重要部分。它的好处，是将美华文学置设在世界华文文学的宏阔背景中作个性把握的，因此其视野开扩又持论允当。阅过整部书稿，即使对美华文学并不怎么熟悉的我，一时也顿觉神清气朗，豁然明白了。我想，这部书对于学界、对于社会的意义，应该是既在文本之中，又在文本之外的。

写这篇小序时，我和万华先生刚从海南与会归来，在那里我们同居一室，曾作多次深夜长谈。其实如果不是开会，平时各忙各的，是难得如此长时间倾心交谈的。他来山东大学工作也已经几年了，教学、科研好评盈耳，但名利场中你却难以见到他的影子。我为有这样一位作君子之交的同事和朋友而高兴，更为学界有这样一位淡泊名利、志在宏运的学者而庆幸。惟愿他早日实现宏愿，为学术界再添一道亮丽风景。

## 从《20世纪中国文学史》到 “20世纪华文文学史” (代前言)

黄万华

1998年10月15日，在美国旧金山的“美华文学研讨会”上，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张炯跟美国华文文艺界协会理事李硕儒有这样一段对话：

李：……美国华文文学是一个蕴藏量十分丰富的富矿……它应该属于未来华文文学史的重要一章。

张：我们想过这个问题。但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不好这样书写，因为不少美国华文作家已经入了美国籍，已属美国作家，如果我们的文学史上载入这一章，会招来外交上的交涉……如果将来写世界华文文学史，就可以名正言顺地写美华文学的成就与地位了。

1997年6月，山东大学中文系孔范今教授主编的《20世纪

中国文学史》(126 万言)出版,这是 80 年代末学术界提出“20 世纪中国文学”的文学史观念后第一部问世的《20 世纪中国文学史》。1998 年,山东大学“211 工程”课题中列入了“20 世纪华文文学史”的研究和撰写。从《20 世纪中国文学史》到“20 世纪华文文学史”,不仅是本文开始所述那种愿望“名正言顺”的实践,更是时空上文学史整体观的自然拓展,其目的就在于深入探寻 20 世纪民族新文学的生命机制。

顺便提及的是,在课题名称上,我们未采用“世界华文文学”这个概念。如同“世界文学”一般约定俗成指称除本国文学以外的世界各国文学一样,“世界华文文学”目前给人的感觉主要是指除中国大陆以外的华文文学,虽然第九届世界华文文学国际学术研讨会(1997-北京)已明确将中国大陆文学研究列入会议议题,但相关研究、传播的重点仍在台港澳和海外华文文学上。这是符合“世界华文文学”学科研究的历史和现状的。我们则从自己课题的侧重点,即在真正整合 20 世纪不同板块的华文文学上作初步探索出发,取“20 世纪华文文学史”的概念范畴。至于“华文文学”这一概念应包括非华裔作家的华文创作,我们觉得,20 世纪的中国大陆等华文主流社会中,并未形成非华裔的少数民族社会(社区),非华裔作家的华文创作,也远未构成一种群体的文化行为,更未能提供可供某种典律构建的作品。一些非华裔作家的华文创作,更多的是作为其民族、国度文化圈中的一种外文写作而存在。因此,我们研究 20 世纪华文文学史,主要内容是力图呈现我们民族新文学在 20 世纪的历史形态,探寻生存环境多元化中的民族新文学所面临的种种困境和由此构筑的生命原动力机制。我们希望,经过努力,有可能将 20 世纪的中国大陆、台港澳地区、海外华人社会三大板块的华文文学整合成某种宽容、和解而又具有典律倾向的文学史。

考察 20 世纪华文文学史，首先感到的是难寻统一的分期标准。原先中国现代文学史、中国当代文学史的分期自然无法通用。例如，20 世纪中国文学格局中的台湾文学，尤其是 20 世纪下半叶的台湾文学，即便摈弃文学史和政治史同步的传统框架，着眼于文学的开放性、继承性、发展性、补充性，也跟中国大陆文学呈现出某种各行其是的轨道，而无法统一在一种文学分期框架中。这种情况一方面启发我们对 20 世纪中国文学史的分期依据作进一步思考，另一方面，也使我们将 20 世纪华文文学视作从古典性、一统性的中国文学过渡到现代性、分合性的华文文学的重要一环，其前景（是重新归于大统一的国别文学还是形成世界性的语种文学）尚不可预测。从 20 世纪华文文学的这种过渡性质着眼，去探寻文学史的另一思路，即不作界线截然分明的分期，而着重描述出其分合的历史态势，从中去把握 20 世纪华文文学史的历史转捩点。

如果这样去看，那么，“五四”时期、40 年代、70 年代构成了 20 世纪华文文学发展的三个关键时期，文学转型、分合态势在这三个时期表现得异常明显。“五四”时期自不待说，这里稍微展开谈一下 40 年代和 70 年代。

如果讲，“五四”时期新文学还主要立足于忧国感时来呼应世界进步文化潮流，从而构建起极有民族凝聚力的辐射影响机制，那么，40 年代文学则以跟世界各国人民直接的心灵沟通、相同的生命体验实现了文学自身的某种转型，大大拓展了民族文学的生存空间。二次大战是中国历史上惟一直接卷入的世界性战争，中国作家第一次广泛而真切地获得了世界文明和邪恶对峙搏斗的生存体验。在跟世界进步文化的关系上，中华民族新文学从“五四”的“呼应”进展到 40 年代的“融入”。而此时“融入”机制的形成，跟作家创作方式的变化有着密切关系。40 年代创

作文化意味的加浓、本土自足生存体系的打破等，都是非常值得关注的。例如，林语堂 40 年代的文学创作，以文化使者的姿态，用西方人极为熟悉的语言形式，多层面地传达了中华民族的生命意志、生存智慧和民族情感。他的作品，成为能“进入西方的‘寻常百姓家’，为社会上一般消费者，像阅读他们自己（国家）的文艺小说一样，能引起读欲并喜爱的”<sup>①</sup>书籍。同时，林语堂的作品又以中译本返回本土，并产生影响（40 年代初，在北京、上海就出版了《京华烟云》不同版本的中文本）。林语堂作品的这种创作、传播方式和过程对于改变中国文学在大陆本土自足生存体系，促使其走向世界产生了不可忽视的重要作用。这种作用的影响所及，直接联系着 20 世纪华文文学的本土自足性有可能代之以跨国别、跨地区的开放性这一创作格局的形成。有了 40 年代文学（例如老舍《四世同堂》、鹿桥《未央歌》在中国大陆和海外两度空间中写成并传播的例子），我们才开始思考：我们民族的新文学可以在一个多大的空间中获得生存发展？

如果讲，世界性、民族性构成了 20 世纪华文文学的基本进程，那么，40 年代是“五四”后诞生的新文学在民族性上呈现成熟形态的时期。1999 年第 7 期《读书》所刊《短篇小说四人谈》，由苏童、莫言、王朔、余华各从古今中外的短篇小说中选择 10 篇其心目中的经典之作谈起，文章“谈”得极有个性体验。在四人所谈的 40 篇小说中，鲁迅和张爱玲是仅有的两位汉语作家，而被谈及的 3 篇鲁迅小说中，却有两篇并非鲁迅《呐喊》、《彷徨》之作：《铸剑》和《采薇》。这些作品何以被作家们视同契诃夫、莫泊桑、福克纳、屠格涅夫、卡夫卡、川端康成等世界大师名作一样？苏童在谈到他选张爱玲的《鸿鸾禧》的“最充分的理由”时所说的一段话道尽了缘由：“这篇作品极具有中国文学的腔调，是我们广大的中国读者熟悉的传统文学的样板，简约

的白话，处处精妙挑剔，一个比喻，都像李白吟诗一般煞费苦心……这样的作品是标准中国的东西，比诗歌随意，比白话严谨，在靠近小说的过程中成为了小说。因此它总显得微妙而精彩，读起来与……外国作家的作品是不同的。”至于鲁迅的《故事新编》，皆取古代圣贤、英雄之心相，让其在日常生活中毕露真相，自然也是对民族性的成熟开掘。所以，在20世纪华文文学自我传承、影响机制中，民族性的延续、丰富，始终是一个基本要素。而40年代文学，从赵树理到孙犁，从老舍到师陀，从吴浊流到钟理和，从萧红到张爱玲，还有冯至、吴兴华、徐訏等，其创作都构成了文学民族性成熟的不同侧面。的确可以说，20世纪华文文学成熟的民族形态是在40年代形成的。

如果囿于中国大陆文学，那么其第三次文学意义上的转换可以认为发生在80年代后期和90年代。而将视野拓展到整个华文文学，各地区、各板块华文文学个性的自觉自立却应以70年代为界限。

经过20余年的对峙、冲突和消长，到了70年代，台湾文学中传统、现代与本土三股文学潮流之间已取得某种平衡，不同文学力量在沟通、妥协、容忍中实际上都致力台湾文学精神的提升，包括如何超越台湾“孤岛”的隔绝，努力定位于中国现代历史脉络中，回归于中华文化的传统长河中；如何深入开掘本土文化资源，构筑台湾文学的生存体系等。现实主义、现代主义、本岛乡土等文学当道并行、各为中心的内在格局呈现稳定状态。从80年代开始，由于各种因素的制衡，“让文学回归文学本身”日益成为台湾作家的共识，各种文学的“异数”都可能被容纳，而作家间的歧见也尽量回到文学自身来化解。台湾具有华文主流社会和特殊“移民社会”的双重性，其文学在传统和现代、乡土和世界、先锋和通俗……上的双栖性在70年代后都开始明显呈现

出来，并跟海外华文文学、中国大陆文学逐步构筑起一种良性互动关系。

刘登翰先生主编的《香港文学史》侧重于“香港文学都市文化品格的形成和都市文学价值的确立”，把70年代作为香港文学发展的“一道模糊的界限，把70年代初期以来作为文学发展的一个新的阶段”<sup>②</sup>。香港文学有些类似于独立后的新加坡华文文学，“城和人”的现代都市文化资源的开掘，是其文学品格得以形成的基石。70年代开始的香港经济繁荣和社会转型淡化了香港文坛的政治对峙，香港文学对自身独立品格的追求主要表现在它对现代工商社会的价值尺度、生活节奏、消费方式抗衡、调适的实践中，香港文学的个性也由此得到日益清晰的呈现，即在速食文化环境中坚持从容的审美创作，在商业的集体消费方式中保留、拓展个体的多元形态。可以说，香港文学的个性在70年代开始得到确认和丰富。

澳门文学从它毗邻的香港文学的巨大身影中走出来而自立，要略迟于70年代。但澳门文学的独异文化内蕴、风格孕成于保存了东西方古典风格的澳门小城和多未开发而充溢着大自然元气的邻近小岛，这种孕育体现在澳门本土作家创作中，在70年代已较明显了。到80年代初，“澳门应该修建自己的文坛”课题的提出和实践，澳门文学就此自觉自立了。

70年代的中国大陆文学尽管还在窒闷中孕育惊雷，但“文革”灾难的蔓延和结束，从深层次上影响、制约，甚至规定了中国大陆文学的今后走向，即文学总要在某种“规范”中努力寻求、提升自身。从“为工农兵服务”到“为人民服务”，从“为政治服务”到“为社会主义服务”，从“政治标准第一，艺术标准第二”到“思想性、艺术性、观赏性的统一”……中国大陆文学必须置于共产党的文艺政策这一大环境中来拓展自身的生存空

间，它要寻求的是在历史的磨合中形成文学创作同文艺政策的良性互动，在政策文化的群体要求中保留艺术个性的丰富形态。

任何文学的生存空间大致都有两个层面，一是跟地域联系在一起，又由政治体制、语言文化环境、自然风俗人情等因素形成的社会空间，二是由文学自身建制提供的生产、消费空间，即有作者和编者（生产者）、读者（消费者）及其公共空间（文学报刊、出版机构、行销市场、流通资金、典律体系等）组成的文学运行机制。在前一个层面上，大陆文学面对的是跟悠久的历史传统和崭新的社会主义制度文化联系在一起的人生悲欢离合。在后一个层面上，作者队伍构成上自由撰稿人和政府机关成员间身份的变动，编者队伍上自由办报人和官方政治审查者之间的交替，读者需求上的社会主义文明熏陶和个体文化消费多样性之间的协调，其他如党的宣传文化部门对传统艺术、主旋律艺术的扶持，文学典律构建上官方性和民间性的互补等，这些都构成了中国大陆文学不同于其他板块华文文学的生存空间。

正是从70年代开始，中国大陆文学奠定了其自觉自立的基石。如同中国现代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终于被西方认同为芭蕾经典一样，共和国时代以来的中国大陆文学一直在寻求社会主义文学典律的构建。70年代结束的“文革”，一方面以惨痛的历史灾难促使了文学的觉醒，另一方面也以中国共产党对“文革”错误的纠正规定了今后大陆文学在社会主义典律构建内运行，因此，大致把70年代作为大陆文学在社会主义“规范”内开始自觉自立的“模糊”时期是可以的。

也几乎是在70年代，地域最为广阔，文化差异也最明显的海外华文文学开始提出其建立“双重传统”的课题。世界华文文学这一概念得以确立，最终依赖于海外华文文学成大气候的创作格局的形成，而海外华文文学脱胎于母国文化而有在居住国自成

一脉的形势出现于 70 年代前后。我曾将近百年的东南亚华文文学创作大致分成 20 至 40 年代的华侨社会时期、五六十年代的华族社会时期、七八十年代的国民社会时期和 90 年代以后的民族交融时期。其国民社会时期对华文文学的转型至关重要。这一时期活跃的东南亚华文作家由于其人生经验、感情方式大都完成于南洋土地，所以其创作也表现为一种较为纯然的南洋国民心态，“双重传统”的课题自然呼之即出了。欧美华文文学相对于东南亚华文文学，显得较为散乱，但在 70 年代后，随着中西文化交流空间的不断拓展，欧美华文文学的文化交流意识日益自觉，从而开始形成自己国别的华文文学个性。例如，美国华文文学“中产阶层性”和“草根性”并存互补的格局就形成于 70 年代后。

我们并非硬要把三大板块华文文学个性的自觉自立都定于 70 年代，而只是把 70 年代作为一个开放的、“模糊”的时期，来呈现 20 世纪华文文学“分”“合”的阶段性的。

将“20 世纪中国文学史”的空间拓展到“20 世纪华文文学史”，也是力图探寻我们民族新文学的典律构建，因为这是撰写文学史的又一块基石。在世纪末众多的典律构建行动中，面向全球华人社会的香港《亚洲周刊》组织评选的“20 世纪中文小说一百强”显得较为客观、成熟（尽管它对海外华文小说还有所忽略）。由“五四”文学传统延续而成的三四十年代创作（主要存在于中国大陆）成为百年文学典律构建的一种“主导力量”。但将“中文小说一百强”的名单铺展开来，情况就起了变化。入选的 100 部小说中，台港及海外华文作家的作品占了 47 部，且绝大多数为本世纪后半叶所作，占同时期入选作品的三分之二。很显然，此时的典律构建已很难以中国大陆文学一种尺度能衡量得了。

关于典律构建的价值尺度，我们着重于两个方面的选取。

一是从“文学经典作为盛行的价值观的对照物”<sup>③</sup>出发，梳理清 20 世纪华文文学在外来思潮冲击下，其现实主义、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之间的递变、冲突，集中于不同的文学价值观间的对照来筛选、确认文学经典。现实主义、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在 20 世纪华文文学中的嬗变明显不同于欧美文学中后者取代前者的有序性，而表现为“进”、“退”交错的“无序”状态。我们特别注意到，40 年代文学中，由文学和社会现实变动的关系所制约影响而产生的现实主义和现代主义之间的“历史的综合”，70 年代后文学中，受人们审美追求上熟悉和陌生化交替作用规律的支配，作家对现实主义、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的选择和相信它们也应被抛弃、被取代情况的共存。这两种情况，具有我们民族新文学的某种世纪性的特征，有利于我们对 20 世纪华文文学经典的筛选、确认。

二是尽量回归文学自身，将作家对文学的殉道精神、对 20 世纪华人生存状况和命运的深切关怀、对语言形式繁富的痴醉探索等，容纳进 20 世纪华文文学典律构建的价值尺度体系中。我们较为看重那些走出“即时状态”的作品，因为整个 20 世纪华文文学粘滞于“即时状态”的程度太深（这里的“即时状态”不仅指社会的政治、经济变动，也指由此关连的文学消费意向、方式等），走出“即时状态”不仅是对文学的一种解放，也意味着不同政治格局、社会体制中华文文学的对话。走出“即时状态”并非脱离“即时状态”，这会让各地区的华文文学既不囿于自身所处现实环境的束缚，而又聚精神气力于民族文化命运根本之所在。这也可能使我们得以避免这样一种情况，即因创作的迎合时势而将实际上虚拟的集体性作为典律构建的一种尺度，导致筛选上的以偏概全。20 世纪华人受压抑、受扭曲的精神层面之丰富，

传统心态、习性所受冲击之巨大，追求正义和复归人性之曲折，在世界各民族之中是罕见的，相比较之下，我们的文学总显出某种贫弱，乃至苍白。因此，治 20 世纪华文文学者，再不能一味迁就历史的沉重，而要尽可能地发掘急迫巨大的百年政治变动冲击下仍存在着的个体的文学创造力。

经典的确认始终是一个文学系统多个层面参与运作的动态积累过程。在 20 世纪华文文学典律构建的过程中，应该坚持历史水平的累积递进提高。因此，我们仔细考察了自 1935 年鲁迅、茅盾、周作人、郁达夫等参与编选《中国新文学大系》以来众多的文学选辑行为，包括台港地区和海外华人社会的文学大系、书系、文库、选集等的编选，思考其中包含的文学史观念的调整、革新、拓展、深化和由此呈现的潜经典意义，同时尽量拓展文学选辑这一典律构建元素的范围，例如翻译，从 30 年代鲁迅屡次向外国友人推荐值得翻译的中国新文学作品起，翻译日益成为一种扩展华文经典文化空间的重要途径。对翻译篇目的选择和翻译作品的传播都拓展着典律构建的世界性视野，理应纳入“选辑”作为典律构建元素的范围。同时，我们也较广泛阅读了海内外学者，包括非汉语的汉学家，通过各种形式的论述（评论、序跋、作家传记、文学争鸣、文学史写作等），对 20 世纪华文文学文本经典意义的诠释，尽量了解各种诠释群体的异同。在上述基础上，我们把不被政治、经济等属性遮没，而保持文学作为人类通过情感性想象去感悟生命之美的方式的独立品格和不被别种强势文化淹没，而保持自己族裔的乡土的文学特性这两条作为 20 世纪华文文学经典积累的历史最低水平线。在坚持这一历史水平线的累积递进提高时，我们应该敏感于其前进的方向，以避免诠释的暗区。文学史上，一些作家所作实验性探索，在当时遭冷落，却垂名于后世，往往是因为这些作家敏感于社会审美情趣、价值

将发生的变化，而别人都还遮蔽于时下定势的文学形式感中。这种敏感显然有着潜经典因素，文学史研究者应该有去激活它。

20世纪华文文学既是一个整体，又有着各行其是的轨道、各守其所的格局，甚至各有自我传承的机制，因此各地区华文文学也当有各自的典律构架。我们在整合20世纪各地区华文文学时，在“公正严苛”上坚持相同的尺度，而在具体的价值尺度把握上，则有相异、变通之处，在这种统一中求变通的典律架构中提出的经典名单，将会在短距离的时间视野中留摄住20世纪华文文学经典累积形成的丰富形态，也会以冷静清醒的学术意识去延续崇尚经典的文学传统。

总之，对20世纪华文文学“分合”历史态势的把握和对典律构建的探索，是我们整合20世纪华文文学的两块基石。在另一组（六篇）“20世纪华文文学整体观”的文章中，我们对上述问题也作了探讨。而这本《美国华文文学论》，连同已出版的《新马百年华文小说史》和《文化转换中的世界华文文学》，则是我们为整合20世纪华文文学所作的早期研究。

（作者单位：山东大学中文系）

- 
- ① 赵淑侠《天涯长青·书展》，台北三民书局，1994年8月版。
  - ② 《香港文学史》，人民文学出版社，1999年4月版，第196页。
  - ③ 佛克马、蚁布思合著《文学研究与文化参与》，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8月版，第三章。